

唐代淄青镇:内在文化原因析论

苑汝杰

(华北电力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2206)

摘要:在河朔型藩镇中,淄青镇最为强大,这与其内在文化原因有关。种族文化与河朔习俗使淄青镇具有优秀的兵力资源;均减赋税、发展生产、重视贸易使淄青镇拥有强大的财力与军事实力,形成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李师道之败亡,是由于内在文化的削弱所致。

关键词:淄青镇;割据;内因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1)03-0139-04

淄青镇(又称平卢淄青)是唐代重要藩镇之一,《新唐书藩镇传》将其列于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之后,学者张国刚先生将其归入割据型藩镇^{[1]44}。自代宗永泰元年(765)第一任节度使侯希逸因军乱被逐,李正己继任,淄青镇割据从此开始。从李正己到其子李纳,再到李纳子李师古、李师道,淄青镇历三世55年,至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而灭。笔者认为,李氏家族能如此长久地盘踞淄青,除唐中央因军力、财力不足多行姑息之政外,还与淄青镇本身的诸多内在文化因素有关:如种族文化与河朔习俗使淄青镇具有优秀的兵力资源,均减赋税、发展生产、重视贸易使淄青镇拥有强大的财力、军力,“礼藩邻、奉朝廷”,形成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而李师道之败亡,是由于内在文化的削弱所致。

一、种族文化与河朔习俗

(一) 汉化较浅、胡化较深的种族文化。淄青镇的管辖范围,在李正己时,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兖、郛、徐等十五州,建中年间四镇之乱,淄青镇失去德、棣、徐三州,此后,直到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淄青镇一直节度淄、青、齐、海、登、莱、沂、密、曹、濮、兖、郛等十二州,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省全部及江苏省的部分地区。然而,其种族文化却呈现“汉化较浅,胡化较深”的特点,即陈寅恪先生所言“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族,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之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2]212}而这种决定淄青镇与唐中央关系的种族文化,与安史之乱的兵力来源及平卢军的南下青齐有关。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安禄山所部及参加叛乱的多为少数民族。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称,天宝十四载,禄山发所部兵同罗、奚、契丹、室韦凡15万众,号20万,反于范阳。《旧唐书·地理志二》也载“自燕州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诸蕃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由此可知,幽州、营州界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契丹、奚、突厥、靺鞨、室韦及其他胡人。

那么,南下青齐后的平卢将士主要以哪个少数民族为主呢?安禄山起兵南下后,留在后方的平卢军除一小部分由史思明统帅,大部分则留驻原地,一直忠于朝廷,并在平乱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至德元载(756),平卢军游奕使刘客奴(后赐名刘正臣)与诸将袭杀被安禄山策反的节度副使吕知诲,朝廷

即任命刘为平卢节度使。至德元载六月,刘正臣率兵进攻范阳失利为安东副大都护王玄志鸩杀,安禄山又任命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又与平卢将侯希逸杀徐归道,朝廷又任命王玄志为平卢节度使。至德二载(757)正月。王玄志派兵使董秦(后赐名李忠臣)和名将田神功率部南下青齐。乾元元年(758)王玄志死,军人拥立侯希逸为节度使,开有唐一代节度使由军士废立之先河。上元二年(761),因“既淹岁月,且无救援,又为奚虜所侵”^{[3]3554},侯希逸遂率平卢将士两万人突破叛军李怀仙防线,于宝应元年(762)一月浮海到达青州,朝廷下诏任命侯希逸为平卢淄青节度使。永泰元年(765)侯希逸因军乱被逐,李正己遂任平卢节度,自此开始其55年的家族统治。

综上所述,其一,来到青齐的平卢士兵主要由刘忠臣部、吕知诲部及王玄志部构成。刘、吕两部军众从前述可知主要来源是胡族,刘忠臣其人家于幽州昌平,是被胡化之人;而安东都护王玄志所辖当为高丽部族。据《旧唐书·地理志二》记载“总章元年九月,司空李勣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县令……”《旧唐书·地理志一》记载了安东都护府统兵人数及马匹是“兵八千五百人,马七百匹”。其二,淄青节度使拥有高丽血统或纯高丽血统兵士。《新唐书·李正己传》(《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四《李正己传》同)云“李正己,高丽人,为营州副将,从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由此可知,侯希逸至少其母系出自高丽,而李正己则是地地道道的高丽人。陈寅恪先生析道:“(侯希逸)种族故含有胡人血脉,其部下兵众亦是胡化集团。是以自李正己袭夺其业后,淄青一镇亦与河朔同风,遂为唐代中央政府之钜患。推求其故,实由其统治者本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也。”^{[1]222}所以说,淄青众将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丽武人集团。

(二)重武轻文的河朔习俗。淄青镇是胡化集团,其风俗自然与河朔风俗同。所谓河朔风俗,是指河朔地区桀骜不驯、强悍难治的胡人习气。《隋书·地理志》对河朔地区的风俗民情有比较详尽的描述:信都等地(按:即唐代成德节度使所辖地区)“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魏郡等地(魏博节度使所辖地区)民风“轻狡”;长平等地(昭义节度使所辖地区)“性尤朴质,盖少轻诈”;太原“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北平辽西等地(平卢节度使所辖地区)“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河朔风俗作了更为深刻的诠释:“(河朔地区)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眊眊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3]卷220}。总之,重武轻文、质朴率性、任侠善战是河朔地区独具特色的风土民俗。

唐人自上至下对淄青镇风俗的河朔化早有清醒的认识。宪宗在其特赦李师道将领夏侯澄等的诏书中,称其地风俗为“污俗”。其文曰“附丽凶党,拒抗王师,国有常刑,悉合诛戮。朕以久居污俗,皆被胁从,况讨伐已来,时日未几,纵怀转祸之计,未有效款之由,情似可矜,朕不忍杀。”^{[4]卷124,3541}又如刘禹锡在其《天平军节度使厅壁记》中说“唯郛州……其人知书、风俗信厚。天宝末,大憨起于幽州,虜将因兵锋取其地,右勇左德,积六十年……公命愚志之,俾来者仰公知变风之自。”^{[5]卷606}

(三)种族文化与河朔习俗使淄青镇具有优秀的兵力资源。这种种族文化与河朔风俗首先使淄青镇拥有优秀的兵力资源,士兵英勇善战,具备优秀的军人素质,如同杜牧在《樊川文集》卷五《战论》中所说“夫河北者,俗险风浑,淫巧不生,朴毅坚强,果于战耕”。其次,习武尚战的风习使淄青镇认识到兵多将广的重要,是故如同河朔三镇,淄青镇也不断扩兵,增强军力。建中初年,魏博兵五万,淮西兵五万,而淄青兵则有十万。

在兵力资源上,与河朔三镇相比,有其相同与不同之处。《新唐书·田承嗣传》记载:(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沉猜阴贼,不习礼仪,既得志,即计户口,重赋敛,厉兵缮甲,使老弱耕,壮者在军,不数年,有众十万。又择超秀强力者万人,号牙兵,自署置官吏,图版税入,皆私有之。田承嗣死,子悦继位,有众七万。而《新唐书·李宝臣传》载:(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以恒、赵、深、定、易五州归朝廷,即拜为成德节度使,于是拥有恒、赵、深、定、易、冀六州之地,马五千,步卒五万。但是,与三镇不同的是,淄青镇幅员辽阔,兵源充足,可以择优选用。从淄青镇的辖域来看,李正己时,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兖、郛、徐等15州,尽管经过建中年间四镇之乱,淄青镇失去德、棣、徐三州,但直到宪宗元和十四

年(819)淄青镇仍然节度淄、青、齐、海、登、莱、沂、密、曹、濮、兖、郛等12州,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省全部及江苏省的部分地区。所以,即使扩兵,也决不可能像幽州节度使朱滔那样“不择士族”,连“容止可观,进趋淹雅”的书生也在应征之列。

二、淄青镇强大的财力与军事实力

(一)均减赋税。《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载:李正己时期“法令齐一,赋均而轻,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如果不是确有其事,司马温公决不会做溢美之词。当侯希逸帅两万河朔将士(不包括随军家属。学者孙慧庆估算“南下将士及家属总有十万人左右”^{[6]79})南到青齐后,肯定会引起当地的不安,为巩固统治,均轻赋税是十分明智的做法。

(二)在粮食富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青齐一带旧俗“轻商贾,务稼穡”,粮食富足。唐玄宗为了增强边疆军事力量,曾设河北转运使,把青州、莱州的粮食运到幽州、平州,以补两地粮食之匮乏。平定安史之乱时,平原郡太守颜真卿一次就资助平卢军粮食10万石,也显示了该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日野开三郎先生就认为平卢军浮海南下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获取山东地区的资粮以维持本军生存^{[7]100},这是很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几乎历任节度使都很重视发展生产。第一任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就“甚著声称,理兵务农,远近美之”^{[4]3534},很得人心。李正己时期,其辖境大多是富庶的平原沃野,加之发展生产,所以做到“赋均而轻”是有可能的。李师古病重时,曾在接班人问题上很忧虑,皆因其弟子道“不更民间疾苦”,“不知衣食所从”^{[8]5992},由此可知他本人无疑会制定措施,发展生产。

(三)利用海陆贸易,弥补不足。淄青李正己家族,自李正己开始,押新罗渤海两蕃使,即负责与新罗、渤海等国的外交事务,因此,淄青镇成为当时新罗、渤海等东亚诸国进京的主要通道和开展贸易活动、文化交往的主要场所。李氏家族利用权力之便,大做马匹、食盐生意。

首先,货市渤海名马,即以货物换取渤海善战的马匹。山东一带并不是马的主要产地,健马的产地在河北。而古代军队中最为精锐的当属骑兵,骑兵对作战的胜利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所以杜牧在《樊川文集》卷五《罪言》中就说“(河北)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李氏家族利用其两蕃使的职权之便,大做马匹生意,《旧唐书·李正己传》中说他“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加之“赋税均轻”,李正己又是高丽人,与渤海新罗人有着共同的语言习俗,所以此时的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经贸往来兴盛。大批名马不断从外蕃购进,淄青镇骑兵兵力得以加强。

其次,以食盐换取牛皮鞋材。李师古与淮西的吴少诚大做以海盐换牛皮鞋材的非法买卖。《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载“吴少诚以牛皮楮材遗师古,师古以盐资少诚,潜过宣武界,事觉,(韩)弘皆留,输之库,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馈。’师古等皆惮之。”盐铁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唐朝设盐铁转运使对二者进行专门管理,私自买卖食盐是违法的。然李师古为食盐所带来的利益所驱使,不但进行非法交易,还对盐池极尽争夺之能事。《新唐书·李正己传》载,“棣州有蛤蜊盐池,岁产盐数十万斛。李长卿以州入朱滔,独蛤蜊为纳所据以专利。后德、棣入王武俊,纳乃筑垒德州南,跨河以守蛤蜊”。穆宗时,被一分为三的淄青镇辖地,还因偷卖私盐获得巨额利益,军资费用绰绰有余。《旧唐书·食货志上》穆宗长庆二年诏书中说到“如闻淄青、兖、郛三道,往来榷盐价钱,近取七十万贯,军资给费,优贍有余。”货取马匹、牛皮是见于正史的,但可以肯定地说,淄青镇绝不会仅做这两宗生意。通过海陆贸易,淄青镇为自己积聚了巨额财富。

食盐、粮食是古代农耕社会的经济命脉,马匹、牛皮鞋材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海陆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均轻赋税稳定了社会秩序,四者相辅相成,使淄青镇具有强大的军力和财力。所以《旧唐书·李正己传》说……“正己复得曹、濮、徐、兖、郛,共十有五州,内视同列,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法令齐一,赋税均轻,最称强大”。到最后一任节度使李师道,淄青镇还是十分强大。唐张读《宣室志》卷七《天贽叛臣》载“唐元和中,李师道据青齐,蓄兵勇锐,地广千里,储积数百万,不贡不覲”。

三、任人唯亲与地方的控制

(一)任用血亲及“腹心之将”担任要职,牢牢控制管内州县,使藩镇在对外战争中能够整体行动。如李正己子李纳曾任淄州、青州、曹州三州刺史,从父兄李洧为徐州刺史;李纳子李师古曾任青州刺史,另一子李师道曾任密州刺史。李纳之婿张升璘,被署为“海州团练使”^{[3]7543}。李师古器重刘悟,“妻以

从媼(妹妹)历牙门右职”^{[8]6012} 李师道亲将王承庆,是李师古之媼^{[8]5995}。

(二) 严法治下,防止了军乱的发生。《旧唐书·李正己传》云,“(李正己)法令齐一”,“为政严酷,所在不敢偶语”,“自正己至师道,窃有郛、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惧众不附己,皆用严法制之。大将持兵镇于外者,皆质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其家无少长皆杀之。以故能劫其众,父子兄弟相传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三《李正己传附师道》同)。

如若对属下不满,淄青节帅常采用秘密处决的方式。如李师古“尝怒其僚独孤造,使奏事,遣大将王济缢杀之”^{[8]5991},即派他去京师奏事,在京师将其处死。李师道也采取过类似的手段,如大将崔承度因批评他“初不示诸将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浆十饼诱之去矣”,因直言遭到李师道忌恨,于是“(李师道)遣承度诣京师,戒候吏时其还斩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还”^{[8]5994}。这些措施,防止了军乱的发生。在河朔型割据藩镇中,淄青镇的军乱是最少的。

四、“礼藩邻,奉朝廷”形成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河朔型藩镇的基本信条是“礼藩邻,奉朝廷,则家业不坠”(《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王廷凑传》)。所谓“礼藩邻”,即与邻藩结成强大的政治军事同盟,以对抗朝廷。“奉朝廷”,即在利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不否定唐王朝的政治态度。可见“礼藩邻,奉朝廷”并不具有同步性。如同张国刚先生所说是以“嗜利性”为前提的游离性与依附性。这两种态度,看似矛盾,实则一体,实际上藩镇借此形成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也是淄青镇能够长期割据的内在原因之一。淄青镇自李正己始,就表现出这种两面性。

李正己49岁发疽而卒,李纳擅袭父位,朝廷兴兵讨伐。“泾原兵变”,德宗仓皇帝出奔奉天,不得已降罪己诏,赦免叛乱四镇,于是四镇罢兵。李纳得到节度使正式任命,不再抗命朝廷,反而听从朝廷调遣,防秋备塞,并遣兵与诸军汇合,大破李希烈,解陈州之围。李纳死后,其子李师古继位。据《旧唐书·李正己传附李师古传》,“师古虽外奉朝命,而尝蓄侵轶之谋”,也属于阳奉阴违之货色。但李师古时期,淄青镇内相对和平,对外也未挑起大规模战争。

李师古病死,其弟李师道继位。起初,因任命制书久未下达,他曾想募兵守境,但在心腹劝谏下,更上书请进两税,守盐法,申官员;也曾献帛万匹助军,收缴盐利上交中央,但不久后,李师道便又在其妻妾、僚佐蛊惑下,走上公然叛唐的道路。宪宗元和九年(814),发动淮西之战,讨伐吴元济,李师道预感到唇亡齿寒。于是,在宪宗讨淮西期间,为了阻挠朝廷用兵,援助淮西,李师道作出了几件很是震惊朝野的大事:一是烧河阴仓粮库,二是刺杀宰相武元衡、裴度。这两件事,《新唐书·李正己传附李师道传》作了十分详细的记载。蔡州平定后,李师道感到惊恐不安,于是上表乞听朝旨,请求割去三州并遣长子弘方入侍。及使者回朝,李师道又中途翻悔,于是宪宗诏诸军进讨,淄青终被平定,李氏家族治淄青三世而亡,割据宣告结束。

李师道的败亡,实际上也是由于上述内在文化的削弱所致。李师道时期,由平卢南来的将士或老弱或亡故,将士来源多出当地,河朔习俗逐渐被齐鲁文化同化,李师道少年继任淄青节度,荒唐无知,不懂稼穡,听命内眷,任用亡命少年,盟友淮西镇又被击破,更重要的是与朝廷对抗,刺杀首辅。这些内在文化原因必然导致李师道的败亡。

参考文献:

- [1] 张国刚. 唐代藩镇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2]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3]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4] [后晋]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5] [清]董诰.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6] 孙慧庆. 唐代平卢节度使南迁之后琐议[J]. 北方论丛, 1992(4).
- [7] 日野开三郎. 安史之乱与唐朝东北政策的后撤[J]. 河北师院学报, 1990(4).
- [8] [宋]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